

## “美国梦”衰落了么?

### ——奥巴马政府重建中产阶级基石的动因与举措

张兴祥

**内容提要** 美国民意调查表明,美国民众对“中产阶级”存在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梦”就是“中产阶级梦”。然而,近20、30年来,收入、变动及支出变动的情况表明,美国中产阶级面临很大的挑战或危机。中产阶级不仅是“美国梦”的重要载体,也是美国政治生活乃至整个自由民主制的根基,中产阶级的衰落意味着“美国梦”的衰落。因此,通过重建中产阶级的基石来重振“美国梦”,成为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实施政治路线图的优先目标。奥巴马政府为此采取了创造工作岗位、提高退休安全保障、促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等措施,并在学费和入学上进行改革,使美国人上得起和易进入大学等,取得了初步成效。不过,美国中产阶级能否重振旗鼓,有赖于美国经济复苏、社会政策调整等根本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美国 美国梦 中产阶级 奥巴马政府

早在《独立宣言》中,美国的开国元勋就庄严宣告:“我们认为以下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sup>①</sup>由是,他们勾画了国家蓝图,树立了国家理想,为美国人民

\* 张兴祥: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邮编:361005)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梦的系统结构、操作层面及国际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13@ZH020)的阶段性成果。笔者在此衷心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和责任编辑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及细节上的指导。文章不足与疏漏,概由作者本人负责。

① [美]杰斐逊、林肯等著:《美国理想之书》,张文武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编织了属于自己的梦。美国历史学家吉姆·卡伦(Jim Cullen)称《独立宣言》为“‘美国梦’的宪章”,<sup>①</sup>可谓一语中的。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美国遭遇史无前例的大萧条,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James Adams)所著的《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问世,使“美国梦”这一词语变得家喻户晓。亚当斯笔下的“美国梦”,就是“对每个人来说,生活将变得更好、更富有和更充足,依照能力和成就每个人都有机会”,<sup>②</sup>而不管其出身的社会阶级或背景如何。经过时间的沉淀,“美国梦”已被赋予一种象征性的政治符号功能,它不仅是美国社会理想的体现,也是美国精神文化——价值观之根,更是美国社会发展之魂。<sup>③</sup>“美国梦”是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凝聚力的集中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中产阶级成了“美国梦”的重要载体,因为中产阶级所追求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满足,恰恰构成了“美国梦”的实质性内涵。如果中产阶级衰落,那就意味着“美国梦”的衰落,美国的国家理想和社会理想也将荣光不再。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产阶级的萎缩,“美国梦”也开始受到质疑,近期的一些民意调查已充分显示了这种倾向。如佐格比国际(Zogby International)2008年的一项民调结果表明,75%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的“美国梦”更难实现。格林伯格-昆兰-罗斯纳研究所(Greenberg-Quinlan-Rosner Research)2009年所做的一项调查也表明,59%的受访者认为对现在18岁以下的孩子来说,“美国梦”更难实现。<sup>④</sup>的确,今天的美国人正面临着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压力,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表明,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而言,“美国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幻了。<sup>⑤</sup>而当“美国梦”的载体——中产阶级遭遇危机时,从国家意识形态出发,美国政府也有拯救其必要。在奥巴马总统的政治话语系统中,我们不难发现,重建“中产阶级”与重建“美国梦”两种提法常常交叠在一起。事实上,通过重建中产阶级的基石来重振“美国梦”,已成为奥巴马两届总统任期内实施政治路线图的优先目标。

本文基于中美既有的研究成果、报刊文章、广播公司新闻、美国政府公开的研究报告、统计数据以及相关民调、访谈等资料,运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历史分析与现状分析、理论阐释与政策分析相结合,从美国的民意调查入手,对“美国梦”与美国中产阶级的关系、奥巴马政府重建美国中产阶级的基石的动因和举措进行探讨。

---

① Jim Cullen, *The American Dream: A Short History of an Idea That Shaped a Natio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9.

② James T. Adams, *The Epic of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31, p. 404.

③ 葛滨:《美国梦之谜:美国国情再认识》,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第228页。

④ Sandra Hanson and John White, *The American Dream in the 21st Century*, Philadelphia, PE: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1.

⑤ Jon Meacham,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Dream: Is It Still Real?” *Times*, July 2, 2012.

## 一、从美国民意调查看“中产阶级梦”

对美国人来说,“中产阶级”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词语了,虽然它本身是一个比较模糊且极具争议的概念。不过,词语的模糊性并不妨碍美国民众理解它的含义,正如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市场与公共关系问题专家琳达·莫顿(Linda P. Morton)教授指出的:“成为中产阶级几乎是所有美国人的梦想。”<sup>①</sup>针对美国公众的许多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人具有强烈的中产阶级情结。例如,2008年,美国全国民意调查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让受访者把自己归入“底层阶级”“劳工阶级”“中产阶级”“上层阶级”四个分类中的一个,约6%的人把自己归入“底层阶级”,45%的人把自己归入“劳工阶级”,45%的人把自己归入“中产阶级”,另外约4%的人把自己归入“上层阶级”。<sup>②</sup>然而,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U. S. Census Bureau)公布的数据,2005年美国的贫困率达到12.6%(2012年上升至15%),20%的人净资产为零。

2013年9月,在由《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NBC News)联合所做的一项调查中,这种“趋中”倾向更为明显。<sup>③</sup>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美国民众把“中等收入”定义为家庭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下,除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受访者外,其他各收入层次的受访者大多倾向于以自己的收入水平作为“中等收入”的标准。例如,家庭年收入在3万美元以下的受访者,有28%认为3万美元以下为“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在7.5万—10万美元的受访者,有39%认为7.5万—10万美元为“中等收入”。

上述民意调查表明,美国民众对“中产阶级”存在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即使是那些实际收入不高的人,也不愿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这种身份认同自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特别是美国人天赋人权、平等及机会均等意识,使他们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产生了一种本能的“趋中”效应。

美国汉密尔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丹尼斯·吉伯特(Dennis Gilbert)对阶级作了如下定义:“如果一个较大的家庭群体彼此的地位大致相同,并与其他家庭存在显著的差别,我们就称之为一个阶级。”<sup>④</sup>基于社会分层的九个变量,他把美国阶级划分

---

① Linda Morton, “Segmenting Social Classes: The Middle Class,” *Public Relations Quarterly*, Vol. 49, No. 3, 2004, pp. 46-47.

② Joseph G. Eisenhauer, “An Economic Defini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Forum for Social Economics*, Vol. 37, No. 2, 2008, pp. 103-113.

③ 资料来源:Wall Street Journal/ NBC News Poll, Sep. 5-8, 2013, <http://pos.org/2013/09/nbc-news-wall-street-journal-11/>.

④ Dennis Gilbert,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In an Age of Growing Inequality*,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p. 15.

为六个,即资本家阶级、上中层阶级、中层阶级、工人阶级、劳动贫穷阶级和下层阶级。中产阶级是相对于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而言的,阶级之间的界线存在一定的模糊区间,“上中层阶级”是否归入“上层阶级”,“工人阶级”是否归入“中层阶级”,关键取决于采用什么样的衡量标准。美国白宫中产阶级专门工作小组(The White House Task Force on Middle Class, MCTF,以下简称“白宫中产小组”)采用多维定义,<sup>①</sup>综合分析经济学、社会学的多个指标,包括房屋所有权、汽车、大学教育、健康与退休保险、家庭度假等,这些大多属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内容,也即“美国梦”的具体内容。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梦”就是“中产阶级梦”。正如白宫中产小组指出的那样,美国家庭要实现他们的“中产阶级梦”,国家就必须拥有一个健康的经济,一个能够提供体面工作(decently-paying jobs)和福利的负责任的私人部门,一个能够为所有孩子提供高质量教育的有效率的公共部门。<sup>②</sup>奥巴马政府重建中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图,选择以上几个方面作为突破口,显然是有理论和现实依据的。

一般说来,收入、财富、消费能力、职业或教育程度比较容易衡量,本文第二部分考察美国中产阶级的历史变迁,主要选择家庭收入中位数(50%分位或中间值)作为中产阶级的代表性指标。

## 二、美国中产阶级面临的挑战

美国中产阶级面临的挑战,不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才出现的,而是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便已见端倪。笔者基于有关历史数据,从收入变动、财富变动和支出变动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考察。

### (一) 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变动

从长期趋势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情况看,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收入增长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如图1)。如果把中产阶级家庭收入增长与经济(以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增长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问题所在。在1948—1978年间,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年增长率为2.53%,经济年增长率为3.98%,二者相差1.45个百分点。1979—2009年间,经济年增长率为2.79%,而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年增长率只有0.43%,二者差距扩大到2.36个百分点。另外,1999年以来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增长基本呈“停滞”状态,2008年后甚至呈下降趋势。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态势下,二者的差距却越来越大,这说明中产阶级家庭收入跟经济增长的联系越来越弱,中产阶级未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以此可以推断,美国总体的收入分配机制出了问题。

① Middle Class Task Force, “Middle Class in America,” Washington, D. C., Jan., 2010.

② Ib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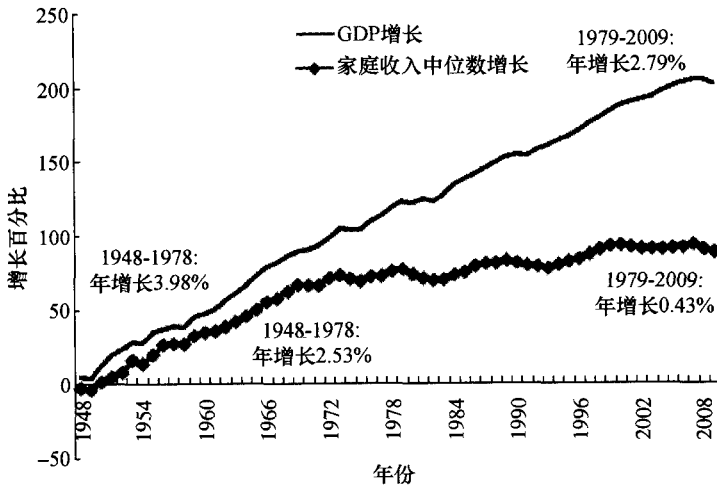


图1 经济增长与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长, 1948—2009年

注: 图中的 GDP 已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 家庭收入以 2009 年的美元价格衡量。

资料来源: U. S. Census Bureau, <http://www.census.gov/>; 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http://www.bls.gov/>。

另一方面, 美国的家庭收入所占份额也发生了相对变动。家庭收入一般按五等划分, 笔者选取最低、中间、最高三个分位数的家庭收入所占份额的变动进行比较。由图 2 可以看出, 最近 40 多年来, 最低分位数和中间分位数的家庭收入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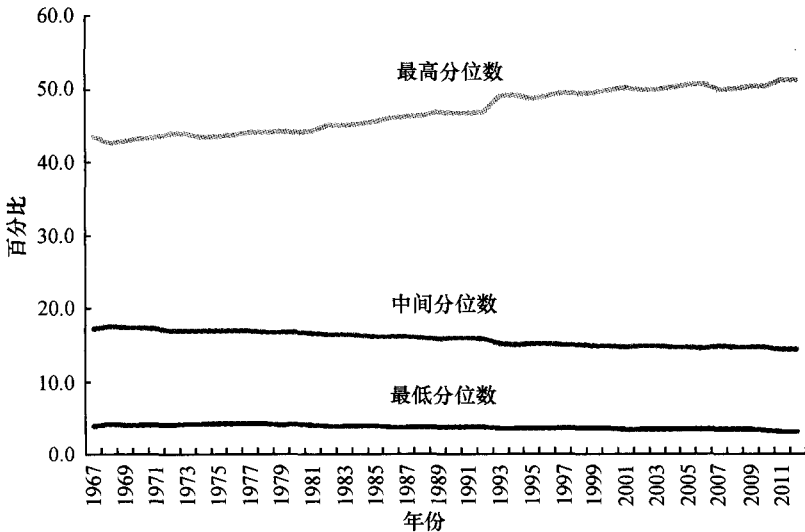


图2 五等分的家庭收入分位数份额, 1967—2012年

资料来源: U. S. Census Bureau, <https://www.census.gov/prod/2013pubs/p60-245.pdf>。

占份额总体均呈下降趋势,与之相反,最高分位数的家庭收入份额却呈上升趋势:中间分位数的家庭收入份额从 1967 年的 17.3% 年下降至 2012 年的 14.4%,最高分位数的家庭收入份额从 1967 年的 43.6% 上升至 2012 年 51.0%。毫无疑问,中产阶级家庭收入份额变小,意味着其收入相对恶化,财富积累也必然受到影响。

(二) 中产阶级家庭的财富变化

如果以家庭财富净值来衡量,那么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净财富差距正在不断拉大,贫富两极分化明显(如表 1)。1983 年,低收入家庭净财富为 1.0963 万美元,中等收入家庭净财富为 9.1056 万美元,高收入家庭净财富为 30.7134 万美元,中等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的净财富比为 8.3:1,高收入家庭与中等收入家庭的净财富比为 3.37:1。到 2010 年,低收入家庭净财富为 1.0151 万美元,中等收入家庭净财富为 9.315 万美元,高收入家庭净财富为 57.4788 万美元,中等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的净财富比为 9.17:1,而高收入家庭与中等收入家庭的净财富比扩大为 6.17:1。就财富的绝对值而言,2010 年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积累的财富,差不多跌回 1983 年的水平。1983—2010 年,中等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的差距没有太大变化,但高收入家庭与中等收入家庭的财富差距却显著扩大了。

表 1 三等分的家庭净财富变化,1983—2010 年 (单位:美元)

年份	1983	1992	2001	2007	2010
低收入家庭	10963	13319	18421	17345	10151
中等收入家庭	91056	90846	129582	152950	93150
高收入家庭	307134	326851	569905	693265	574788

注:各年份的家庭净财富总额以 2011 年的美元价格衡量。

资料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Aug. 22, 2012,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2/08/22/the-lost-decade-of-the-middle-class/>。

再从家庭净财富的变动率来看,1983 年以来,美国所有等级的家庭净财富增长呈现跌宕起伏的变化,不言而喻,这是经济周期性的波动所致。1992—2001 年,堪称美国经济的“小黄金期”,三个收入等级的家庭净财富均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低收入家庭为 38%,中等收入家庭为 43%,高收入家庭增长最快,达到 74%,比中等收入家庭高出 31 个百分点。从低到高,家庭净财富积累呈非线性的递增现象。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家庭净财富增长率明显放缓。2001—2007 年,低收入家庭出现了负增长,中等收入、高收入家庭的增长幅度也下降,但后者仍高出前者 4 个百分点。<sup>①</sup>

① 资料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The Lost Decade of Middle Class,” Aug. 22, 2012,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2/08/22/the-lost-decade-of-the-middle-class/>。

2007年,以次贷危机为发端,美国爆发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双重大幅下挫,美国家庭的财富蒸发了15万亿美元(以2008年的美元价格衡量)。<sup>①</sup>这些蒸发的财富,很大一部分属于中产阶级。2007—2010年,中等收入家庭财富缩水39%,高收入家庭财富虽也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明显低于前者。总体上看,1983—2010年,中等收入家庭净财富只增长了2%,而高收入家庭净财富增长率却高达87%。据此不难断言,美国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的财富鸿沟正在不断扩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危机成为一种财富再分配的机制,在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中,中产阶级的财富无疑遭到“洗劫”,从而使财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

### (三) 中产阶级家庭的主要支出变动

与收入增长减缓、财富缩水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产阶级家庭主要支出却呈现强劲增长势头。表2是中产阶级家庭1990年与2008年在住房、医疗保险、大学费用三项主要支出上的对比。

表2 中产阶级家庭收入与主要支出变动比较

类项	未扣除通胀因素			扣除通胀因素		
	1990年 实际价格 (美元)	2008年 实际价格 (美元)	增长率 (%)	以2008年美元 衡量的1990年价格 (美元)	2008年 实际价格 (美元)	矫正通胀后 的增长率 (%)
家庭收入	50700	53400	5	81100	53400	-34
住房*	79100	197600	150	126600	197600	56
医疗保险**	1200	5100	325	2000	5100	155
大学***						
—公立	5200	13400	158	8400	13400	60
—私立	13200	30400	130	21200	30400	43

注:\*住房按中位数价值估算;\*\*医疗保险包括保险费和现金支出,为年支出数额;\*\*\*大学的费用包括学费、食宿费等,不论公立、私立均为四年。

资料来源:U.S. Census Bureau, “Income, Poverty, 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2,” Washington, DC, 2012, <https://www.census.gov/prod/2013pubs/p60-245.pdf>;其他:Middle Class Task Force, “Middle Class 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Jan., 2010, <http://2010-2014.commerce.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migrated/Middle%20Class%20Report.pdf>。

由表2可以看出,1990—2008年,在扣除通胀因素后,中产阶级的家庭收入实际增长率为-34%。但住房、医疗保险和大学费用却大幅飙升。1990年,房价与

<sup>①</sup> Christian Weller and Jessica Lynch, *Fraying the Private Safety Net: Household Wealth in Freefall*,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2009.

中产阶级家庭收入比为1.56:1,2010年这一比值上升到3.70:1。扣除通胀因素之后,住房支出的增幅为56%,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费用支出增幅分别为60%和43%,医疗保险支出的增幅则高达155%。

毋庸讳言,遭受金融危机洗劫的美国中产阶级现实处境每况愈下。近年来,美国国内媒体和学界频频使用“危机”“困境”“焦虑”“衰落”“削弱”“坍塌”“挤压”(squeezed)、“破败”(battered)、“精疲力竭”(wiped-out)、“失败者”(losers)、“萎缩”(shrinking)、“消亡”(disappearing/vanishing)等词语来形容当前美国中产阶级的处境。的确,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中产阶级来说,要维持他们父辈的生活方式越来越难了。如何使他们摆脱困境,是奥巴马政府所面临的挑战。

### 三、美国中产阶级缘何衰落

美国中产阶级衰落的原因,已成为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社会热议的话题。有学者把它同全球化联系起来。从时间节点看,二者的出现确实惊人一致。从广义上讲,全球化主要指经济全球化。<sup>①</sup>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促进了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同时也在不断改变原有体系的力量对比与国际格局。经济全球化直接带来全球产业结构及相应的职业结构、收入分配的变动,从而也改变了中产阶级在全球体系中的分布和面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兴经济体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sup>②</sup> 发达国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现象是,收入不平等加剧,贫富分化严重,许多人从中产阶级跌落下来,沦为贫穷阶级,两极化社会逐渐形成。据此,有评论认为,从历史角度看,中产阶级是自由政治秩序的支撑,但现在正受到全球化的侵蚀。<sup>③</sup> 另有学者则把它归因于技术进步和信息技术革命。<sup>④</sup> 笔者以为,全球化和技术革命固然削弱了美国中产阶级赖以生存的基础,但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奉行的施政哲学及实施的税收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

#### (一) 全球化和技术革命带来的影响

为什么全球化和技术革命对美国中产阶级产生不利影响? 归结起来,原因

---

① 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贾格迪斯·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通过贸易、国外直接投资(FDI)、短期资本流动、国际劳动力和人类流动及技术交流,将一国的国民经济整合于国际经济中”。详见 Jagdish Bhagwati, *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

② 周晓虹主编:《全球中产阶级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3页。

③ David Ignatius, “The Danger in a Declining Middle Class,” *The Washington Post*, Jan. 4, 2012.

④ Monica Szeles, “On the Declining of the Middle Class as an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Evidence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Bulletin of Transilvania University of Brasov*, Vol. 1, No. 50, 2008, pp. 289-294.



有四：

一是制造业萎缩。在全球体系下,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生产方式重新组合,生产管理因地制宜。由于大公司可以从高附加值的投资和出口中获得更多的利润,这类产品和服务得以保留在美国国内,而那些低附加值的产品生产则转移到海外,这是资本的逐利本性使然。众所周知,制造业曾是美国普通家庭尤其是工薪阶层进入中产阶级的“门径”,然而在过去的60年,美国制造业减少了许多工作岗位,其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全部岗位的比例由1950年的30%缩减至2000年的11%和2011年的9%(如图3),制造业工人也从2000年的1700万降至2011年的1170万,其总数少于1941年5月的岗位数量,创历史新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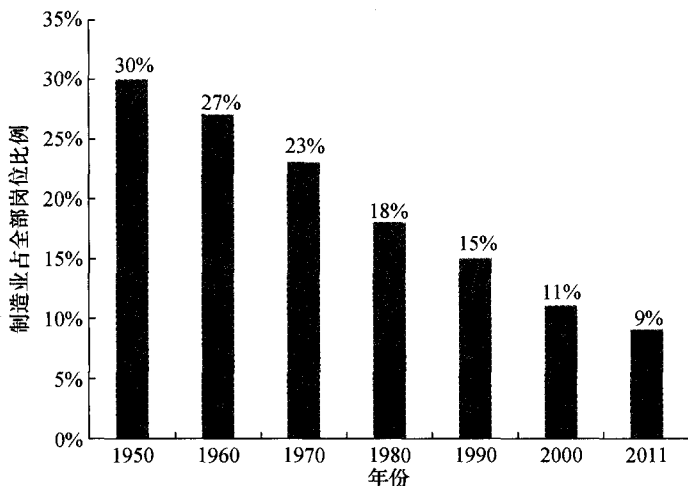


图3 制造业就业岗位占全部岗位的百分比,1950—2011年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Employment, Hours, and Earnings from the Current Employment Statistics Survey,” <http://www.bls.gov/pdq/SurveyOutputServlet>。

当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工人的薪酬水平只有美国工人的一半)转移,蓝领工作也随“风”而去,原本拥有体面工作的制造业工人只能去屈就低报酬的工作。乔治·W. 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劳工统计局曾预测2002—2012年10年内工作增长率最高的10个职业,其中有7个是诸如服务员、门卫、厨师和出纳员等低薪服务性工作。<sup>①</sup>在20世纪80年代,只有不到30%的工作属于低薪工作,而现在这一比例上升到40%以上。

制造业萎缩带来的产业空心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因为它

<sup>①</sup> 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02—2012 Employment Projections,” Washington, D. C., Feb. 11, 2004.

将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一旦工厂关闭,工厂所在的市镇便面临严酷的“寒冬”:所有围绕工厂而生的商业——酒吧、餐馆、食品店、药店——都受到影响。曾经的“汽车之城”底特律的衰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sup>①</sup>

二是信息技术革命催生的劳务外包。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革命是全球化的重要推手,为劳务外包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依托强大的信息技术平台,现在一些生产性、技术性和事务性的工作均可实行外包。如果说美国民众(特别是工薪阶层)对过去制造业向海外转移还能忍受的话,那么近期日益增长的劳务外包新趋势却不能不让他们感到愤怒了。许多大型公司为了降低成本,纷纷把高报酬的工作外包出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采用离岸外包(offshore outsourcing)形式,经济衰退期间尤甚,这等于把中产阶级的饭碗端掉了。据美国咨询公司哈克特集团(Hackett Group)统计,2002—2012年,仅在信息技术、人力资源、金融和采购领域,就大约有66.3万个大型公司的工作被外包到海外。该公司预测,到2016年,这些行业还将有37.5万个工作岗位移至海外。<sup>②</sup>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一次国会演讲中援引官方的估算,美国每年外包的工作竟达到25万个。<sup>③</sup>劳务外包加速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这也是一些评论家将之归咎于全球化的重要原因。<sup>④</sup>

三是贸易逆差。产业空心化与贸易逆差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制造业生产线转移出去后,便只能依赖进口。从服装鞋帽、家具、玩具、器械到电视、相机、自行车、汽车乃至电脑等,这些美国曾经能制造的产品,现在全都依赖进口。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便告别了贸易盈余的时代,90年代后期贸易逆差迅速扩大,2006年达到了7617亿美元的历史峰值,2008年后贸易逆差虽有所缩小,但仍在4000亿—5000亿美元的区间徘徊(如图4)。贸易逆差被视为“扼杀工作”(job-killing)——尤其是中产阶级工作的——罪魁祸首,它导致美国丧失了曾经拥有的数以百万计的好工作。<sup>⑤</sup>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国内质疑自由贸易的声音开始向政治领域蔓延,如美国著名投资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Corporation)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和《财富》杂志资深主笔卡

---

① 底特律曾是辉煌的工业城市,人口最高峰时达到200万(现在只剩下70万),被誉为“汽车之城”。1896年,亨利·福特(Herry Ford)在这里生产第一辆普通百姓的汽车——T型车。由于欠下180多亿美元的长期债务和数十亿美元的短期债务,2013年12月3日,美国联邦法院宣布底特律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破产案。

② Paul Davidson, “More US Service Jobs Heading Offshore,” *CNBC*, Dec. 7, 2012.

③ Matthew Rothschild, “Bernie Sanders Denounces Free Trade Pacts,” Oct. 13, 2011, [http://www.progressive.org/bernie\\_sanders\\_free\\_trade.html](http://www.progressive.org/bernie_sanders_free_trade.html). 2015-03-12.

④ Nicolas Mokhoff, “Will Globalization Choke Our Middle Class,” *Electronic Engineering News*, Jul. 3, 2006.

⑤ Patrick J. Buchanan, *Suicide of a Superpower: Will America Survive to 202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1, p. 14.

罗尔·卢米斯 (Carol J. Loomis) 就宣称,美国的贸易逆差等于“把我们脚下的土地出卖了”。<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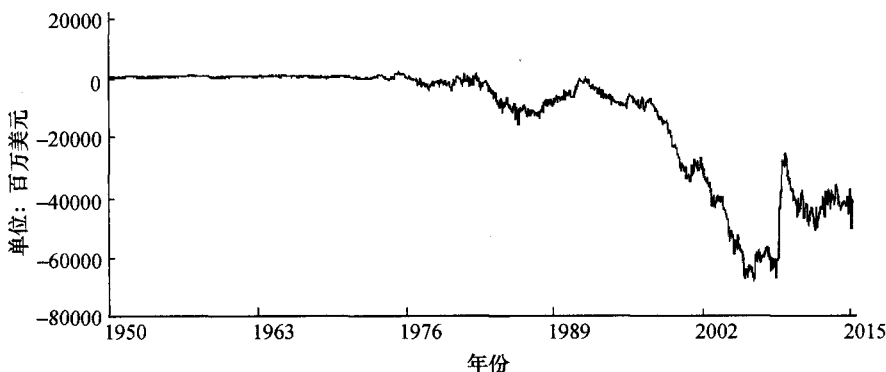


图4 美国的贸易平衡情况,1950—2015 年

注:年度数据均为当年度1月份的数据。

资料来源:U. S. Census Bureau, “United States Balance of Trade,” [www.tradingeconomics.com](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

四是财政赤字与巨额联邦债务。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财政预算一直处于赤字状态,40 多年来只有 1998—2001 年 4 个年份有盈余。2009 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 1.4 万亿美元,占当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10%,2010 年仍保持这一水平,2011 年近 1.3 万亿美元,2012 年后开始收窄,少于 1 万亿。但由于历年累积叠加的缘故,2012 年联邦债务总额已超过 16.35 万亿,是当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104%。据估计,在此后的若干年,联邦债务总额仍将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100%。美国财政赤字和巨额债务,与贸易逆差有直接的关联,<sup>②</sup>贸易逆差扩大意味着外债不断增加,美国已由历史上最大的债权国沦为最大的债务国。

政府欠债总是要还的,还债最终只能通过税收途径解决。鉴于美国税收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sup>③</sup>而中产阶级又担当该项税收的纳税主力(详见下文的税收政策),那么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联邦巨额债务便成了一条高悬在中产阶级头顶的“债务悬河”,对他们的收入和财富形成无形的挤压。

① Warren Buffett and Carol Loomis, “America’s Growing Trade Deficit Is Selling Nation out from Under US,” *Fortune*, Nov. 10, 2003.

② 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 (Paul Volcker) 告诫国会,美国财政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贸易不平衡,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回到贸易不平衡问题上来”,因为“许多年来,美国的消费量已超出其生产能力”。详见 David Dickson, “Volcker Blames Recession on Trade Imbalances,” *The Washington Times*, Feb. 5, 2009。

③ 以 2011 年为例,美国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的 47.4%,公司所得税占 7.9%,社会保险和退休金收入占 35.5%,消费税占 3.1%,其他(含遗产税)占 6.9%。个人所得税为主要税种。

## (二) 美国政府奉行的施政哲学

有论者(通常来自美国保守主义阵营)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党政治和公共政策的作用非常有限。然而,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雅各布·哈克(Jacob S. Hacker)指出,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政党政治和政府的公共政策在经济社会领域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sup>①</sup> 因此,不能把中产阶级的衰落仅仅归咎于全球化和技术变迁,美国的政治生态特点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意识形态非常多元的社会,充满各种“主义”,其中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与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这里所说的新自由主义,主要指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也即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它是一种与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截然对立的经济理论。<sup>②</sup> 而新保守主义主要指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出现的具有保守倾向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者原本也是自由主义者,但他们由激进趋向保守,迅速地“被保守主义化”了。近些年来,新保守主义获得一个特定含义(常作为贬义词使用),指美国以单边主义、通过武力实现全球霸权的强硬外交政策。继尼克松和福特之后,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言人,共和党的里根入主白宫,标志着美国保守主义卷土重来。其后布什父子相继接力,新保守主义得以在美国政坛长期扎根。新保守主义奉行的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规则,其最鲜明的特征是“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即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不谋而合。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与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逐渐出现合流现象,从而使华盛顿决策中心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政府的施政哲学很少强调政府作为裁判角色的作用,而是强调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sup>③</sup> 华盛顿奉行的经济哲学,被亨利·吉鲁(Henry Giroux)称为“经济达尔文主义”(Economic Darwinism),也就是国家的经济决策渗透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竞争法则的思维。在吉鲁看来,它确立了一种合法的意识形态,但断送了批判性的探讨、道德责任、社会和经济公正。<sup>④</sup>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在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著《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① Jacob S. Hacker, "The Institution Foundation of Middle Class Democracy," in Michael McTernan, ed., *Priorities for a New Political Economy: Memos to the Left*, London: Policy Network, 2011, p. 34.

② 国内学者也把罗斯福“新政”式的自由主义称为“新自由主义”,这一自由主义实际上属于凯恩斯主义范畴。由于不同对象被冠以同一名称,易导致理解上的混乱,在此特别说明。

③ The Future of America Democracy Foundation, "Foundation Projection II: The American Dream," <http://thefutureofamericandemocracyfoundation.org/Project1.html>, 2015-03-10.

④ Henry A. Giroux, "Neoliberalism's War on Democracy," Apr. 26, 2014. 这是刚出版不久的《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义之战》一书的节录,参见 Henry A. Giroux, *Neoliberalism's War on Higher Education*, Haymarket Books, 2014, <http://www.truth-out.org/opinion/item/23306-neoliberalisms-war-on-democracy>, 2015-03-12.

一书的导言中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笔者注:麦克切斯尼这里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相当于上文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混合体,下同)一直是美国主流政治党派、大多数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实施的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sup>①</sup>当它进入华盛顿的最高决策层,必然摇身变为哈克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所说的“赢者通吃的政治”(Winner-Take-All Politics)。<sup>②</sup>

在西方国家,政治捐款(political donations)或“竞选献金”(campaign contributions)已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常态化现象。但政治捐款也为有经济实力的个人或集团用金钱影响政治运作提供了可乘之机,并由此而衍生了“金权政治”(plutarchy,又称财阀统治)。“赢家通吃的政治”实质上就是一种金权政治。当政治资金的多寡成为政党及其候选人能否在竞选中胜出的决定性因素,美国社会中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便愈演愈烈。<sup>③</sup>比对以下两个数字,便一目了然:在美国的政治选举中,占美国人口的0.25%的最富阶层的政治捐款,占有个人捐款的80%;公司与工人的捐款之比为10:1。<sup>④</sup>可以说,竞选需要的献金越多,利益集团对华盛顿的影响力也就越大。事实上,美国民众对这种趋向不无担忧。2002年,美国安然公司的破产案牵出小布什政府的竞选献金丑闻,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新自由主义被华盛顿奉为政治—经济宝典,美国的政治体系便越来越被富裕阶级的利益所左右,民主已被金钱所代表的市场权力所腐蚀,日益堕落为一种“易腐败的商品”。<sup>⑤</sup>

### (三) 美国政府实施的税收政策

“赢者通吃的政治”在美国税收政策方面亦有明显体现。众所周知,税收是财富再分配的工具,如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政策,都涉及重大的利益分配问题,其变化自然离不开社会思潮的影响,而这些变化背后更有可能反映的是某一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税收政策由此成为利益角逐的“靶场”,也就不言而喻了。哈克和皮尔逊直言不讳地指出,在过去的30多年中,“在一个缺乏现代效率的政治体

---

① [美]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导言),徐海铭、季海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在这篇导言中,麦克切斯尼还把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样板——“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内涵概括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三重特性。

② Jacob S. Hacker and Paul Pierson, *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 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0.

③ Jacob S. Hacker, “The Institution Foundation of Middle Class Democracy,” p. 34.

④ [美]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导言),第5页。

⑤ Lewis H. Lapham, “Feast of Fools: How American Democracy Became All about the Rule of Money,” *Lapham's Quarterly*, Fall, 2012.

系中运作”的美国政治组织,成功地实施了减税(尤其是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及降低富人税率的政策,并且竭力消除或阻止任何制衡或监督公司高管的力量,包括削弱董事会和股东的发言权、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的监管及工会的力量。他们认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为了使“富者愈富”而“抛弃了中产阶级”。<sup>①</sup>政党、政客和“御用学者”,都在为建立一个“赢家通吃”的政治体系而不遗余力地忙碌着。以下试举所得税和遗产税两项政策予以佐证。

先说所得税。美国于1913年引入累进所得税,<sup>②</sup>首次课征的最高边际税率(以下所说税率均指边际税率)为7%。1913—2013年最高、中间、最低三个档次的税率变动情况显示,从“大萧条”之前的20年间,美国所得税税率经历了一个“低—高一低”的变化过程。<sup>③</sup>

20世纪30年代初,罗斯福“新政”推出后,所得税最高税率一路攀升,1944年达到历史最高点94%。1944—1963年,最高税率一直维持在90%以上的水平。1981年里根主政白宫后,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里根政府推行的“经济复兴计划”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减税,特别是给富人减税。<sup>④</sup>1982年,所得税最高税率由70%降至50%,1986年的税改方案再次下调至38.9%,1988年降至历史最低点28%。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高与中间税率的差距,由1963年的49%缩小至2012年的7%。相对而言,中等收入者的税负比富人更重,中产阶级收入下降及财富增长停滞(1983—1992年中等收入家庭净财富增长为零),正是始于里根政府执政时期。

再看遗产税。一般认为,大幅度的累进遗产税是实现经济民主化的主要工具。美国于1916年开征遗产税,初始税率为10%,次年上调到25%,之后略有升降。1934年,罗斯福政府时期,遗产税被当作实现社会公平、建立福利保障系统的有效手段之一,最高税率提高到70%,并一直持续到1940年。1941—1976年,税率达到了77%,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征收的最高的遗产税税率。对遗产课征如此高的税率,其意在于防止巨额财产带来的代际传递效应,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和平等。不过,从1977年开始,美国遗产税税率便一路下调,2012年已降至35%。<sup>⑤</sup>也就是从

---

① Jacob S. Hacker and Paul Pierson, *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 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 pp. 59, 115, 219, 228.

② 1909年,英国率先采用累进所得税税种。

③ U. S. Tax Foundation, “Federal Individual Income Tax Rates History,” [www.taxfoundation.org](http://www.taxfoundation.org).

④ 在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的“华盛顿共识”中,税制改革及降低边际税率被列为十大政策主张之一。详见 John Williamson,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John Williamson, ed.,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0.

⑤ Darien Jacobson, Brian Raub, and Barry Johnson, “The Estate Tax: Ninety Years and Counting,” <http://www.irs.gov/pub/irs-soi/ninetyestate.pdf>; U. S. Tax Foundation, “Historical Federal Estate Tax Exemptions and Rates,” [www.taxfoundation.org](http://www.taxfoundation.org).

那时起,美国社会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从历史的视角看,对美国顶层收入者来说,税收实际上是累退的,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最高税率均呈不断下降趋势,而最富有阶层的收入和财富绝对量却是与日俱增。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在剔除通胀因素后,1981年最高税率50%的起征点为超过14.418万美元,2012年最高35%的起征点为超过38.835万美元。遗产税的起征点也不断提高,1976年起征点为6万美元,2001年,小布什总统推动国会通过了《经济增长与税收救济协调法》(Economic Growth and Tax Relief Reconciliation Act),将起征点由67.5万美元提高到100万美元,此后起征点大幅提高,2011年已达到500万美元。在这个标准下,美国只有不到1%的富裕家庭面临着缴纳遗产税的问题。收入和财富增加了,纳税却相对减少,社会财富向1%、0.1%乃至0.01%的金字塔顶层集中。<sup>①</sup> 免除累进所得税中对资本利得(租金、利息、红利及其他形式的资本收入)的征税,结果是税收由主要劳动收入承担。也就是说,中产阶级成为纳税主体。<sup>②</sup>

#### 四、为何要重建美国中产阶级的基石

美国根植于一个由中产阶级支撑的社会,因而被誉为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sup>③</sup> 可以说,中产阶级是美国政治生活乃至整个自由民主制的根基,在现代政治和意识观念中占据中心位置。<sup>④</sup> 尽管中产阶级本身是一个多元化的混合体,但不论是用手投票还是“用脚投票”,中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力都不容忽视。就美国的政治生态而言,中产阶级并非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sup>⑤</sup>

##### (一) 中产阶级是自由民主制的“锚碇”

由于中产阶级大多赞同自由民主制,所以它理所当然地成为自由民主制的基础。当民主政治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时,它就趋向于最为稳定的形式,这

---

①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信息,1979—2007年间,即使在扣除了公共和私人福利及联邦税收后,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累积的家庭收入总和的40%,也比底下90%的美国人同期获得的家庭收入加起来还要多。这意味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美国经济增长,差不多都进入最富有的1%的群体的口袋。详见Jacob S. Hacker, “The Institution Foundation of Middle Class Democracy,” p. 34。

②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510—511页。

③ Robert Faris, “The Middle Class from a Sociological Viewpoint,” *Social Force*, Vol. 39, No. 1, 1960, pp. 1-3.

④ Joseph Gerteis, “Political Alignment and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1974—1994,” *Sociological Forum*, Vol. 13, No. 4, 1998, pp. 639-666.

⑤ 1967年底,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Joseph Klafter)让“美国中产阶级”一词在政治圈中流行起来。1969年11月3日,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在题为《沉默的大多数》(The Great Silent Majority)的演讲中称这些人是“沉默的大多数”。

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那里。<sup>①</sup> 几乎所有关于民主、民主化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文献,都提及中产阶级的重要作用——它是整个民主体制得以运行的基础。<sup>②</sup> 《华盛顿邮报》副主编兼专栏作家戴维·伊格内修斯(David Ignatius)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没有中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就失去它的锚碇。”<sup>③</sup> 中产阶级之所以成为自由民主制的“锚碇”,除了因为它是自由、民主、私有产权等这些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外,还在于它拥有在人口数量上的优势,亚里士多德对此也作过论述。<sup>④</sup> 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著名论断“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表达了同样的思想。<sup>⑤</sup> 从美国的社会分层看,情况也是如此。表 3 是几位美国社会学家估算的美国社会各阶级所占的比例。

表 3 美国社会阶级分层模型及各阶级比例

丹尼斯·吉尔伯特 (Dennis Gilbert)	威廉·汤普森 (William Thompson)、 约瑟夫·希基 (Joseph Hickey)		雷纳德·比格利 (Leonard Beeghley)				
阶级	指标	阶级	指标	阶级	指标		
资本家阶级(1%)	职业 教育 收入	上层阶级(1%)	职业 收入 教育	极富有阶级(1%)	收入 教育 职业		
中上阶级(14%)		中上阶级(15%)		富有阶级(5%)			
中低阶级(30%)		中低阶级(32%)		中产阶级(46%)			
工人阶级(30%)		工人阶级(32%)		工人阶级(36%)			
劳工贫穷阶级(13%)		低层阶级(20%)		穷人阶级(12%)			
底层阶级(12%)							

资料来源: Dennis Gilbert,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In An Age of Growing Inequality*, Belmont, CA: Wadsworth, 2002; William Thompson and Joseph Hickey, *Society in Focus*, Boston, MA: Pearson, Allyn and Bacon, 2005; Leonard Beeghly,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MA: Pearson, Allyn and Bacon, 2004。

①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四卷中做了这样的表述:“在一切城邦都有三个部分或阶层,一部分是极富阶层,一部分是极穷阶层,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最优良的政治共同体应由中产阶层执掌政权。凡是中产阶层庞大的城邦,就有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中产阶层最强大时可以强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当中产阶层超过了其余两个阶层或者仅仅超过其中之一时,这种情况下的政体就有可能保持稳定”。详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0—142 页,第 145 页。

② Harry Kreisler, “Elizabeth Warren Interview: Conversations with Histo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C Berkeley, Mar. 8, 2007.

③ David Ignatius, “The Danger in a Declining Middle Class.”

④ 亚里士多德指出:“任何一个城邦在构成上都有性质和数量两个方面。所谓性质,我指的是自由、财富、教育和门第。所谓数量指的是人数上的优势。”详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第 144 页。

⑤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93, p. 418.



一般情况下,“中上阶级”和“中低阶级”可归并为“中产阶级”,那么根据表3的估算结果可以看出,美国中产阶级所占的比例大致在40%—50%的区间内,在所有阶级(层)中数量最多。需指出的是,表3估计的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各阶级所占比例的情况,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在现代国家,创立和维持一个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民主政治,目的是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但美国现在似乎正面临着丧失中产阶级特征的危机。可以想象,如果中产阶级衰落,数量大为减少,美国民主制的基础就会发生动摇,从而引发各种社会危机。正因为如此,奥巴马执政后积极采取各项应对措施以重振中产阶级。

## (二) 中产阶级是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稳压器”

中产阶级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对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作用甚大,对此,美国社会各界差不多已达成共识。<sup>①</sup> 尽管丹尼尔·贝尔曾断言“经理阶层的兴起,意味着权力不再继续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特殊集团手中,权力的连续性体现在机构职位方面。统治权大部分掌握在技术—知识中坚集团手里,这包括公司经理和当时占据机构职位的政治领导人”。<sup>②</sup> 但从历史发展进程看,他们没有形成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力量。中产阶级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强的市场能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一般情况下,他们追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富足与安逸,不希望社会出现激烈的动荡。因此,他们是社会秩序忠实的维护者。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查尔斯·蒂特尔(Charles Tittle)和马里兰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雷蒙德·帕特诺斯特(Raymond Paternoster)曾把中产阶级的共同规范归结为十条,即忠诚、隐私、节俭、因袭传统、责任、参与、温和、正直、和平和友善。<sup>③</sup> 中产阶级拥有的这些共同规范,正是构成社会和谐稳定必不可少的价值元素。当然,中产阶级成为社会政治的“稳压器”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他们的根本利益不能受到侵害,否则他们也会成为激进运动的鼓与呼者。美国历史上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运动,很多时候都是由中产阶级担当主角。

## (三) 中产阶级是捍卫自由、民主、平等社会价值观念的重要政治力量

美国社会有影响力的群体,如作家、评论家、记者、编辑、科学家、律师、学者及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等,大多来自中产阶级中上层。除了具有独立人格和思想外,

---

① 详见 Seymour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Robert Putnam et al.,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②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铨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4页。

③ Charles Tittle and Raymond Paternoster, *Social Deviance and Crime*, Los Angeles: Roxbury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他们还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习惯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社会,以解剖刀似的思想分析社会问题。<sup>①</sup>可以说,中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是美国政治腐败和社会“道德病”的“解毒剂”,在反腐败运动中,他们曾是最坚定不移的推动者。美国报业巨头、揭黑运动的开创者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坚持这样的理念:“新闻必须具有揭露社会弊端的特色。”<sup>②</sup>20世纪初,《麦克卢尔杂志》(*McClure's Magazine*)和《美国杂志》(*The American Magazine*)新闻记者兼作家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在美国新闻界掀起了一股揭露社会黑暗的文学浪潮,其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政治腐败和城市腐败,其著作《城市之羞》(*The Shame of the Cities*, 1904)、《新泽西州之贩卖记》(*New Jersey: A Traitor State*, 1905)均体现了中产阶级作为社会道德和良心的监管员的角色价值。2011年11月,美国爆发的旨在反对大公司及金钱腐蚀民主、法律和政策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产阶级也担当主力,原因很简单,他们是这场危机的主要受害者。不难想象,一旦中产阶级群情激奋,鼓噪而动,就会危及社会稳定,这是任何当政者不能不加以关切的重要原因。

#### (四) 中产阶级是经济复苏的动力之源

从历史发展规律看,一个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总是伴随着中产阶级规模的不断扩大,并成为社会的主导群体。20世纪50年代初,被誉为“新左派”的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Mills)出版了《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把经理、专业人员组成的“白领”视为新的中产阶级。<sup>③</sup>1956年,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人的数目首次超过了蓝领工人。在科学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日益专门化的过程中,新中产阶级所代表的新的科学与技术是一种进步的、“能者治理”的力量。<sup>④</sup>现代经济体系越来越依赖于技术进步和知识创业,中产阶级便毫无悬念地成为企业家精神的摇篮,在工业社会中处于中心位置。他们既是经济建设的主力,又是社会消费的主体,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美国社会结构的特点之一,在于白领与蓝领的界线,特别是白领下层与熟练工人之间的界线不明显。这就使得美国中产阶级更能成为工业社会的凝聚力量,可以在重新整合美国社会的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换句话说,中产阶级将引领社会的进步与改革。<sup>⑤</sup>既然中产阶级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如此巨大,那么美国的经济复苏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他们。早在入主白宫之前,奥巴马就已意识到,政府推动的各项社会改革离不开中产阶级的支持,因此他在竞选演讲中,郑重宣告要重建中产阶级,他的第一个承诺便是税收改革,

① 吴迁俊:《理念·制度·传统:论美国“揭黑运动”的历史经验》,《新闻大学》2010年第4期。

② [美]W. C. 斯旺伯格:《普利策传》,陆志宝、俞再林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③ Charles Mills,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51.

④ 朱世达:《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演变与思考》,《美国研究》1994年第4期。

⑤ 周晓虹主编:《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112页。

将为 95% 的美国民众减税。<sup>①</sup>

### (五) 奥巴马总统被视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代表

美国“第三条道路”(Third Way)副会长吉姆·凯斯勒(Jim Kessler)曾说到,“如果你赢得了中产阶级,你就赢得了竞选;如果你失去了中产阶级,你就与竞选无缘。”<sup>②</sup>的确,中产阶级在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在投票时比工人阶级更为积极活跃,其政治倾向性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候选人的命运。当他们从一个政党转向另一个政党时,就会改变政治进程的力量平衡及政治争论的焦点。例如,雪城大学政治学教授杰弗里·斯顿卡什(Jeffrey Stonecash)研究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发现中产阶级(主要为白人)的政治倾向性对总统大选具有决定性影响,例如 1964 年,中产阶级鼎力支持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林登·约翰逊,但 1968 年和 1972 年却转而鼎力支持共和党的理查德·尼克松;1976 年他们反过来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1980 年又转向支持共和党的里根。<sup>③</sup> 共和党和民主党可能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但对于中产阶级,他们却有许多共同话题。<sup>④</sup>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由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主导的每次总统大选运动,都把目光投向中产阶级。

由于近二三十年来中产阶级面临许多问题,改善中产阶级的困境就成为美国总统大选的宣传策略。例如,2004 年,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就曾用“中产阶级悲惨指数”攻击小布什总统的经济政策,以期在大选中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事实表明,谁获得大多数中产阶级的支持,谁就有可能成为竞选的赢家。2012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产阶级再度成为两党争夺的焦点。奥巴马和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角逐美国总统时,中产阶级的支持率成为决胜的关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二者在这方面判然有别:在那些把自身定位为中产阶级的受访者中,52% 的人认为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将帮助他们,而只有 42% 的人认为罗姆尼将帮助他们;38% 的人认为奥巴马将帮助富人,而 71% 的人认为罗姆尼将帮助富人。<sup>⑤</sup> 奥巴马出身于中产阶级,罗姆尼出身于富裕阶级,相比之下,前者更能代表普通美国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美国梦”。2004 年,奥巴马当选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时,就有时事评论家预言“他(奥巴马)的故事代表面向 21 世纪的美国”。<sup>⑥</sup> 的确,

<sup>①</sup> Tom Troy, “Obama Vows to Rebuild American's Middle Class,” *McClatchy-Tribune Business News*, Sep. 1, 2008.

<sup>②</sup> Joshua Green, “The Angry Middle Class,” Sept. 23, 2010, <http://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0/09/the-angry-middle-class/63417>, 2015-03-11.

<sup>③</sup> Jeffrey Stonecash, *Class and Party in American Politic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0, pp. 95-96.

<sup>④</sup> Robert Samuelson, “‘Saving’ the Middle Class,” *The Washington Post*, Aug. 26, 2012.

<sup>⑤</sup>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Lost Decade of the Middle Class.”

<sup>⑥</sup> Debbie Howlett, “Dems See a Rising Star in Illinois Senate Candidate,” *USA Today*, Mar. 18, 2004.

奥巴马的人生传奇本身就是“美国梦”的一个样板。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重建中产阶级基石和重振“美国梦”是奥巴马政府的政治承诺。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发酵后,美国“全国人民都深感焦虑,因为他们感觉(美国梦)的承诺正从他们指缝间滑走”。<sup>①</sup>此前,在2006年出版的《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The Audacity of Hope: 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一书中,<sup>②</sup>奥巴马就已释放了他的政治信号。次年,他在《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指出“认为美国力量最终衰落是完全忽视了美国伟大的承诺及对于世界的历史意义”,并承诺“如果我当选总统,从执政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会践行诺言”。<sup>③</sup>诚如奥巴马的传记《奥巴马:诺言筑就权力》书名所标示的那样,<sup>④</sup>奥巴马是以“诺言践行者”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美国民众对此寄予厚望。就任后,奥巴马必须兑现他的承诺。当然,奥巴马政府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实现经济复苏是当务之急,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应致力于重建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一个公平而繁荣的社会。<sup>⑤</sup>

事实上,美国最大的经济挑战无疑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sup>⑥</sup>因此,不难理解,重建中产阶级何以成为奥巴马政府政治路线图的优先目标。<sup>⑦</sup>在这个问题上,奥巴马和副总统拜登已达成共识。如奥巴马声称“我们的经济力量可以用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来衡量”,拜登也说“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等于一个强大的美国”,“让中产阶级——我们这个国家的支柱——发展并重新壮大是我们的责任”。<sup>⑧</sup>

## 五、重建中产阶级基石的举措

2009年1月30日,奥巴马主政白宫的第十天,就成立了白宫中产小组,由副总统拜登领衔,小组成员由国家行政机构与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组成,包括劳工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教育部、能源部、财政部、商务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交通部、

---

① Tom Troy, "Obama Vows to Rebuild America's Middle Class," *McClatchy-Tribune Business News*, Sep. 1, 2008.

② Barack Obama, *The Audacity of Hope: 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Crown&Three Rivers Press, 2006.

③ Barack Obama,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 Vol. 84, No. 4, 2007, pp. 2-16.

④ David Mendell, *Obama: From Promise to Power*,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9.

⑤ Robert Kuttner, "Obama's Economic Opportunity," *The American Prospect*, Vol. 20, No. 1, 2009, pp. 1-4.

⑥ Rex Nutting, "U.S. Democracy Is a Victim as the Middle Class Fades Away," *Market Watch*, Feb. 2, 2015.

⑦ Christopher Caldwell, "Just Who Are We? America's Middle Class Dilemma," *Financial Times*, Sep. 7, 2012.

⑧ Middle Class Task Force, "Annual Report of the White House Task Force on the Middle Class," Washington, D. C., Feb.,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100226-annual-report-middle-class.pdf>.

农业部各部的部长,环境保护局局长,国家经济委员会、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国内政策委员会主管及经济咨询委员会主席等。白宫中产小组的成立,标志着奥巴马政府重建中产阶级工程正式启动,其首要目标是致力于解决中产阶级面临的关键问题,加快推进行政改革,提出对工人阶级有特别重大影响的行政指令、立法和政策建议等,从而提高美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家庭生活标准。重建蓝图把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并举,显然是为了让工人阶级中更多的人进入中产阶级行列,以壮大中产阶级。奥巴马政府的主要举措,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 (一) 保护工人与创造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

鉴于中等收入工作岗位的流失是导致中产阶级萎缩的重要原因,学界热切呼吁政府要重建美国的制造业部门。特别是最近这次衰退期间,95%失去工作者属于中产阶级。因此,在小企业、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快工作创造步伐以促进工作岗位增长,扩大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成为奥巴马政府的不二选择。在具体措施上,白宫中产小组把工作重心放在制造业就业、绿色工作、项目劳动协议(Project Labor Agreements)、负责任的联邦合同、加强劳动标准及帮助工人建立“发言机制”等方面上。

奥巴马总统和拜登副总统曾不止一次公开支持工会和集体谈判,把它们视为重建中产阶级的中心议题。实施劳动标准、履行负责任的联邦政府合同及颁布《雇员自由选择方案》(Employee Free Choice Act),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奥巴马政府保护工薪阶层的执政精神。作为美国推动绿色能源产业计划重大举措之一的先进能源制造业减税计划(AEMTC),把清洁能源部门的工作创造同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联系起来,也是奥巴马政府经济策略中的一个重要举措。白宫经济咨询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与清洁能源部门之外的其他同等职业相比,绿色工作的薪酬平均要高出10%—20%。<sup>①</sup>为此,《美国复苏及再投资法》(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以下简称《复苏法》)推出900亿美元的绿色能源投资,预计将带动150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其目标是创造500万个的“绿色工作”。对遭受金融危机洗劫的中产阶级来说,这或许是一个福音。另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家庭妇女的就业率逐年提高,由1970年的43.3%提高到2008年的59.5%,<sup>②</sup>其收入也是工薪阶层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奥巴马重申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自由和机会的承诺,先后签署了《莉莉·莱德贝特公平报酬法》、《防止对妇女施暴法》,宣布2013年8月26日为妇女平等日,并敦促国会通过《工资公平

① Middle Class Task Force, “Annual Report of the White House Task Force on the Middle Class.”

② U. S.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Handbook of Labor Statistics*, Bulletin 2340, Table 6; U. S. Census Bureau, *2010 Statistical Abstract*, Section 12 (Table 583).

法》(Paycheck Fairness Act)。他还在白宫成立了“同工同酬全国特别小组”,以制止公然违反公平报酬的行为。<sup>①</sup> 上述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及有关政策的实施,旨在于夯实美国中产阶级的基础。

## (二) 提高退休安全保障

金融危机过后,美国工薪阶层对他们的退休安全保障感到异常焦虑。许多工薪阶层发现他们的401(K)养老保险失去了30%—40%的价值,<sup>②</sup>年届退休的员工,其生活水准大大低于预期。另外,与金融资产价格下跌的步调一致,全美的房价也出现暴跌,进一步侵蚀了退休安全,因为住房投资是许多中产阶级家庭最大的单一投资。许多工人尤其是中低收入工人,长期以来没有资格参与退休计划。数据显示,2007年美国家庭工作年龄的户主,只有60%有资格参与401(K)退休计划(401 K Plans),而有资格参与的人当中,又有15%的人根本不参与,也就是说,将近半数的美国工人(7800万)没有获得雇主提供的退休计划。<sup>③</sup> 即使有资格参与,许多人的储蓄也是少得可怜,更何况那些按规定费率缴费的工人,他们的退休储蓄回报大部分被高昂的费用吞噬了。

考虑到养老保障事关成千上百万美国人的退休生活,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措施包括:(1)建立自动化的个人退休账户(IRA),即按工资总额扣除,为那些没有参与雇主退休计划的工人提供一种新的储蓄途径;(2)简化及扩大储蓄存款,对其实行税收减免并提供政府配套奖励;(3)修正401(K)规定,提高其透明度、安全性和规则化;(4)改善退休安全保障的行政诉讼,帮助工人为退休储蓄;(5)提供安全投资选择,鼓励工人特别是中低收入工人储蓄更多的退休金,而当务之急是为他们提供一种安全的、抗通胀的投资选择,如“通胀保值国债”(TIP)和“保障型退休金账户”(GRA)。

## (三) 促进工作与家庭责任的平衡

如上所述,越来越多的美国妇女走向工作岗位,夫妻的双薪收入成为中产阶级家庭的普遍模式。对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来说,夫妻一方肩负养家糊口的重任、另一方在家担当看护者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还,金融危机更显著地加剧了这种趋势。数据显示,1970年,孩子年龄在6岁以下的母亲,只有30%从事有酬工作,2007

① The White House, “Proclamation on Women’s Equality Day 2013,” Washington, D. C., Aug. 23, 2013.

② 401(K)也称401K计划或401K条款,指1978年美国《国内税收法》新增的第401条K项条款,1979年得到法律认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这是一种由雇员和雇主共同缴费建立起来的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它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美国诸多雇主首选的社会保障计划。

③ Brian Buck, et al., “Changes in U. S. Family Finances from 2004 to 2007: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Feb., 2009.

年,这一比例上升到60%以上。<sup>①</sup> 单身母亲的就业率,也从1970年的56.8%提高到2008年的65.3%。<sup>②</sup> 事实上,随着推迟工人退休年龄,年轻的已婚男女双方必须更多地分担家庭看护责任,但许多工作场所并未对这种现实变化做出适时的调整。与此同时,2000年以来儿童看护成本快速增加,其增长速度是中等家庭收入增长率的两倍。中产阶级的经济稳定需要政策帮助他们平衡工作与看护责任,这样他们不必为了照看孩子和老人或继续充电而远离工作场所。

针对广大中产阶级家庭面临的现实问题,奥巴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措施,包括:(1) 扩大儿童和亲属看护费用的税收减免,年收入4.3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可享受儿童看护费用20%的减免,单个孩子的家庭最高可减免3000美元,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最高减免6000美元;(2) 对低收入工薪家庭增加儿童看护援助,《复苏法》为“儿童看护和发展基金”(CCDF)提供2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此目的;(3) 成立“学前教育挑战基金”(ELCF),奥巴马为该基金提议一项93亿美元的资金以确保许多孩子能顺利入学;(4) 支持家庭看护,在2011年财政预算年度,白宫中产小组会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建立一个新的看护者主动权计划,为“国家家庭看护支持项目”(NFCSP)和“美洲印第安人看护支持项目”(NACSP)注资5000万美元,另追加5000万美元作为成人日托、家庭服务等相关项目的交通补助。除此之外,政策还着眼于建立更为灵活的工作场所,如扩大带薪休假范围,通过《家庭与医疗休假法》(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涵盖面扩大至25个雇员以上的企业,<sup>③</sup>使美国员工得以有机会请假照顾新生婴儿、生病的孩子或家人。

#### (四) 使高等教育付得起和易进入

长期以来,美国民众一直追求教育机会均等,教育被视为“改善自我”和“出人头地”的途径,是“美国梦”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sup>④</sup>当然,也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特别是争取中产阶级地位——的根本动力。不仅如此,人们还经常把中产阶级同更好的教育结果联系起来,因为中产阶级对教育绩效的期望将对教育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一个中产阶级强大的社会,在公共教育上投资更多,并有力地促进教育标准和教育绩效的提升。<sup>⑤</sup> 一般说来,中产阶级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然而,实际情况是,白宫中产小组的年度报告表明,2004—2010年,只有一半左右的美国学生读完大学,低收入家庭的毕业率就更低了。<sup>⑥</sup>

① 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Women in the Labor Force: A Databook* (2009 Edition), Sept., 2009.

② 数据来自 U. 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③ 之前规定只适用于雇员超过50人的企业。

④ 葛滨:《美国梦之谜:美国国情再认识》,第228页。

⑤ David Madland and Nick Bunker, “The Middle Class Is Key to a Better-Educational Nation,”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ction Fund, Nov., 2011.

⑥ Middle Class Task Force, “Annual Report of the White House Task Force on the Middle Class.”

让更多的人获得并保住中产阶级的工作职位,奥巴马政府立足于长远目标,把加强教育作为重建中产阶级的坚实保证,这些政策措施在《复苏法案》和“奥巴马-拜登计划”中均有涉及,包括针对学前儿童教育的“1—5岁”计划和针对12岁以下儿童的K-12计划。相比之下,针对高等教育的政策措施内容更为丰富。2009年6月,美国教育部推出“基于收入水平的还款”(IBR)计划,给联邦学生贷款的还款封顶,贷款者可根据自己的收入和家庭规模确定还款额度,此举意在减轻教育贷款的还款压力。同时,着手学生贷款改革,即把所有的学生贷款并入“直接借贷项目”(DLP),减少“联邦家庭教育贷款”(FFEL)对新生贷款的补助,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扩大佩尔奖学金(Pell Grants);建立“美国机会税收减免”(AOTC)制度,每年为大学本科生减免2500美元左右的学费;创建“大学入学与毕业基金”(CACF),2011年的财政预算投入35亿美元;简化学生申请援助的手续,激发州级的金融创新活力,提高大学毕业率,缩小成功的差距;改进529号大学教育储蓄计划(529CSP),使之对中产阶级家庭更有效、更可靠;扩大低息的联邦帕金斯贷款(FPL)。其他措施还包括:加强社区大学教育,大部分学生完全免交学费;扩大工作—学习项目,把工人同职业生涯阶梯联结起来,把创新作为增强培训项目及为中产阶级家庭提供好工作(特别是在未来的清洁能源部门)的关键,等等。

除上述四个方面外,奥巴马政府的改革还延伸至税收、医疗、金融服务和债权等领域。2008年竞选总统活动期间,奥巴马向中产阶级承诺税收减免计划,即每年税收减免2000亿美元。2009年的《复苏法案》提出总额2883亿美元左右的减税和税收直接支出,受惠的主要对象是小企业和个人,显然,中产阶级是税收减免的主要受益群体。至于医疗保险,表3表明,在中产阶级家庭支出中增幅最大。2009年8月19日,奥巴马在《纽约时报》撰文,声称“医疗改革关乎人民的生命和生活,医疗改革与人们的切身利益攸关,医疗改革关乎美国的未来”。<sup>①</sup>中产阶级对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更是充满期待,而这一期待终于瓜熟蒂落。2010年3月21日,医疗改革法案获得众议院通过,成为奥巴马17个月任期内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兑现了他选举时的承诺。

## 结 论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吉尔伯特和康奈尔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瑟夫·卡尔(Jeseeph Kahl)就已指出,“蓝领和白领的界限已经失势,阶级结构的根本分裂正向上移动,更为广泛的是,位于阶级结构上半部分的美国人看来在靠损害下半部分人的利益而获得优惠和权力”。<sup>②</sup>2002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

① Barack Obama, “Why We Need Health Care Reform,” *New York Times*, Aug. 19, 2009.

② [美]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彭华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6页。



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甚至宣称,美国已成为一个金权政治的国家,中产阶级在美国已经终结。<sup>①</sup>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Ohmae Kenichi)的观点与克鲁格曼不谋而合,他认为自“里根革命”之后,美国社会就开始出现了“收入两极化”,形成左右两端高峰、中间低谷的“M型社会”。<sup>②</sup> 最近,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亦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不平等爆发,扩大的不平等大部分来自顶层的“1%”,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9%上升到2000—2010年的大约20%,增加了11个百分点。在他看来,金融危机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正是美国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助推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sup>③</sup> 由于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扩大,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就已逐渐沦落,2008年的金融危机无非是加剧这一沦落的趋势罢了。当然,现在就断言美国已形成明显的“M型社会”为时尚早,目前,美国中产阶级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仍占较大比重。

事实上,支撑“美国梦”不是别的,正是美国相对持久稳定的经济繁荣。对此,美国文化史学家劳伦斯·萨缪尔(Lawrence Samuel)作了这样的比喻,“美国梦”犹如一股猛浪,随经济繁荣的潮汐而上涨,当经济繁荣的盛况不再,“美国梦”也就随之退潮。<sup>④</sup> 在就业机会短缺、收入增长停滞、财富大幅缩水的情况下,住房、医疗和教育费用等却全面飙升,这是美国中产阶级面临的现实困境。奥巴马2009年入主白宫后,致力于推动重建中产阶级的工程,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以帮助美国中产阶级渡过难关。在2012年的大选中,奥巴马和拜登郑重做出把重建中产阶级作为优先目标的承诺。这可以从奥巴马争取中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公平正义,以及“回归美国价值”的竞选主题上看出。此前,已有媒体评论指出,当奥巴马或罗姆尼试图重建中产阶级的基石时,把里根和威廉·克林顿(William Clinton)两人的政治遗产放在一起学习将会有所教益。<sup>⑤</sup> 扶持和培育中产阶级,重建中产阶级的基石,拯救“美国梦”,仍然要着眼于美国总体经济的改善,这是先决条件。不过,美国中产阶级能否重振旗鼓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当中流砥柱,除了取决于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还取决于美国政府社会政策的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特别是收入两极化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失衡问题)的变化,同时也离不开美国政治意识形态、施政哲学的转变及操作国家机器的权力实体的支持。只有这些根本性问题得以破解,美国的中产阶级才不会与“美国梦”渐行渐远。

① Paul Krugman, "The End of Middle-Class America," *New York Times*, Oct. 20, 2002.

② [日]大前研一:《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刘锦秀、江裕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38—40页。

③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302—303页。

④ Lawrence Samuel, *The American Dream: A Culture History*, Syracus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97-198.

⑤ Jon Meacham,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Dream: Is It Still Real?" *Times*, July 2, 2012.